

从接攘到融合

——古 DNA 研究中的考古学思虑

黄 颖 高蒙河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提 要: 分子生物学与考古学的交叉, 既呈现出令人可喜的共融趋势, 但在实际操作中也确实存在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 尤其体现为两学科研究人员视野的偏差和话语的隔绝所引起的合作各环节的阻滞。如何在学科交叉伊始, 便理性地意识到并解决好这些问题, 进而使学科交叉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 已然成为令人思虑的现实问题。

考古学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种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量运用。其中, 古 DNA 研究为考古学人类遗骸研究视野的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分子生物学由此进入并在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中崭露新姿, 同时, 分子生物学也由此拓宽了自己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并深化了内涵。

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对象的分学科研究进而谋求相融的终极结果, 近年来常被称之为具有趋向性前景的学科交叉。然而, 这种的确是更现代意义上的交叉, 在取得初步性成果的同时, 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换言之, 所谓交叉学科研究的有效性, 必须建立在对所涉学科差异的客观性和结合的过程性的理性认识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或者说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离有历史的渊源, 也有其内在的原由, 两者在对象、内容、方法、规则以及职能、使命上的诸多差异性导致了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不可避免的障碍性, 以分子生物学为依托的古 DNA 研究和定位于人文学科范畴的考古学在结合的大趋势下, 也实际存在着系列有待思索和解决的问题, 目前阶段, 尤为突出地表现课题设计理念 and 具体操作层面上。

首先, 在第一步的课题设计和样本采集工作中, 研究者本身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直接决定着研发材料的价值定位, 材料所含信息的提炼手段与利用程度, 也很大程度上因研究者所拥有的分析手段及其兴趣取向而定。工作性质的差异使得采样工作, 往往只能由考古人员完成, 而考古学传统的以器物研究为中心的文化历史研究定位, 又容易使考古研究者的视角万变不离其宗地难以摆脱惟器物中心的羁绊, 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其他种类遗存的研究价值, 发掘工作中“取器弃骨”的遗憾现象仍不绝于缕。对出土人骨至多只进行常规的形态鉴定便以为功至垂成, 并且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轻视后代墓葬人骨研究的现象, 造成大量古代信息的人为流失, 而且无法弥补。即便极具前沿意识者取样测试, 也由于缺乏相关的生物学知识, 而着实无从下手或因操作不当造成数量或质量上的缺损, 增加了后续研究的难度。

其次, 在分析测试过程中, 考古学者往往只作为测试样品的提供者而被隔绝在外, 样品也多被从原属文化背景剥离出来孤立地加以测试。这种处理虽对于保证测试结果的客观性有利, 但容易导致测试的盲目性和测试手段的无针对性。不同学科研究的关注点和问题意识毕竟存在差异, 话语的隔绝和交流的缺乏也更容易割裂研究意图和技术手段的内在联

系性，从而减弱手段之于意图的有效性，如在目前的古 DNA 研究中，虽然已有学者从考古学角度提出了个体、社会结构和群体层面可能由分子生物学测试结果解决的问题，但是材料的特殊性和关注点的差异使得技术手段相对滞后。

再者，对于测试结果，考古学者也通常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对于结果或者不明就里而无法应用，或者因与自己的原定研究主题相去甚远而加以搁置，科学测试并未真正融入全盘的研究计划，呈现贴标签式的形式主义倾向而非多维综合的研究成果。也较少检讨新的技术和方法与考古学原有手段如类型学、层位学以及年代学等的关系，学科的交叉被曲解为结果的生硬嫁接而非思维方式和知识话语的真正交融与互动，给人以鸡说鸡话，鸭讲鸭语的感觉。迄今为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即使最新出版的大型考古报告，也仍然是在延续 50 年代初期的编写模式，所有实验研究报告都是作为报告主体的附录形式列表于后，至多是报告结语里提及一下而已。

还有在两学科的结合形式和这种研究本身的学科意义定位上也尚存疑虑。

诸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实践的推进和理性的思索，例如针对学科思维方式和知识话语的隔绝弊端，是否可以多考虑到研究的整个过程都由双方研究人员共同完成。当然鉴于每个学科领域的知识都存在着一程度的专业化，对交叉学科的双方都不能求全责备。比较切实的方法是，一方面考古学者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加以提高，另一方面，那些科学分析的手段和结果也应根据考古学的要求加以调整，既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对自然科学方法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和变通，使其更能为考古学者所接受。

更佳的方法也许是培养专门的跨学科研究人员致力于此，这些研究人员应具备相应的素质：一是要真正熟悉分支学科方法本身；二是要进行扎扎实实的资料搜集和考订工作，强调动手能力；三是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敏锐的洞察力培养跨学科研究人员。学科的磨和也不应限于实验室的标本测定，而应贯穿于考古遗物的掘取、整理和研究的整个过程中，纳入整个发掘乃至整个学科的研究体系中，例如在研究设计中从宏观上首先必须建立起遗存的时空框架，时序上由早及晚，空间上由点而面，架构起人类自身缘起和发展的动态网络；而在每个点上有必要进行深度挖掘，设计具体的研究计划，充分利用个体信息、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遗传信息，以切实解决相关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

方兴未艾的古 DNA 研究技术，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而考古学研究的特殊性又促使技术手段不断作出新的调试和探索，这种研究视野和手段的辩证关系也正是学科本身多元发展的动力源泉。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先生主张中国考古学要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其要义也盖在于此。学科的差异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只能在局部上应用自然科学方法，而且这种应用也不能是简单移植式的，而应该在实践中积极审慎地以创新式的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渗透融合式的交叉。